



错过了这个村，就没有那个店。小说中的主要情节与细节，电影都是照本宣科。文化馆的人凡是看过的，都说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当初自己也是受不了这种气氛，一气之下回到阀门厂。这些年，一点点地走过来，回头再看，文化人那点事，闹来闹去，最终都成了让人吐槽的糗料。文人相轻，起码要相隔三百年，这太不值得啊！所以，这些年我抱定一个原则，凡事能忍则忍，不能忍则避让。武汉封城初期发生的一些事也是如此，实在不行时，曾冲着夫人大吼一通，弄得夫人眼泪汪汪，自己心里一软，外面的百般艰难便都不值一提了。

## 乡村与现实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的代表作中篇小说《村支书》《凤凰琴》和《秋风醉了》都是1992年发表的，之后又创作了引起很大反响的《分享艰难》，再往后又有三卷本的长篇小说《圣天门口》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天行者》，你因此被批评界认为是新现实主义作家，你是怎么看待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？你觉

得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什么不同？

刘醒龙：在我所理解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，往往较喜欢下结论，作预测，好指引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流露出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味道！我的这种判断不一定对，但也有许多现成的例子摆在那里。从20世纪90年代起，世界变化的节奏突然加快，而好一点的文学作品是必须将岁月做一番沉淀才能上手形成的，更不用说经典文学了。那些一见到风浪过来，就急于用文学来表态的，比如指“诗歌将死”，“小说将死”，“乡村和乡村文学将死”的，结果正好相反，小说和诗歌还在，乡村更是以“绿水青山”面貌寓意其恒久绵长，将死的却是犹闻在耳的那些指指点点。凡事指旧东西的不足比较容易看得清，一种新生的创立自然是对不足的破解，人与现实的不和谐，会是文学新势力的基本出发点。

得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什么不同？

刘醒龙：在我所理解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，往往较喜欢下结论，作预测，好指引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流露出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味道！我的这种判断不一定对，但也有许多现成的例子摆在那里。从20世纪90年代起，世界变化的节奏突然加快，而好一点的文学作品是必须将岁月做一番沉淀才能上手形成的，更不用说经典文学了。那些一见到风浪过来，就急于用文学来表态的，比如指“诗歌将死”，“小说将死”，“乡村和乡村文学将死”的，结果正好相反，小说和诗歌还在，乡村更是以“绿水青山”面貌寓意其恒久绵长，将死的却是犹闻在耳的那些指指点点。凡事指旧东西的不足比较容易看得清，一种新生的创立自然是对不足的破解，人与现实的不和谐，会是文学新势力的基本出发点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凤凰琴》写乡村教师，《天行者》也写乡村教师，小说是否有原型的？

刘醒龙：当代文学与当代现实发生碰撞时的情景，很难预料，也很难控制。武汉封城战疫，让自己

对早期经历有了新的认识。如果没有这段极其异常的日子，关于《凤凰琴》《天行者》原型的问题，不知将来会不会做出明白的回应。作为代表作的《凤凰琴》，发表之初，在我生活过的故土，相关反响却不甚愉快，即便是后来《天行者》所获得的种种荣誉，亦不过如此。疫情期间，原国务院主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李岚清给我来过一封信，说了一些情真意切的话，让自己颇为感动。武汉解封之后，回英山县城给已故作家举办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，自己这才坦承，当年写这两部作品，其原型地为英山县孔坊乡父子岭小学。同行的於可训先生，闻之欣然动笔写了一篇随笔记录这件事。武汉大学的刘早博士还专门写了一篇《〈凤凰琴〉〈天行者〉原型地考》。两篇文章各有其妙，都令人不胜唏嘘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蟠虺》写的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尊盘，写这样一部小说是想以此来反思楚文化吗？创作《黄冈秘卷》是为自己生活的土地树碑立传吗？黄冈和湖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感觉这两部作品，有种冥冥之中与湖北武汉的抗疫斗争存在某种预兆式的关联，是不是这样的？

刘醒龙：湖北武汉从地理人文上讲，有点曾侯乙尊盘的意味。在2018年4月28日“东湖叙谈”和2016年4月出版的《蟠虺》之前，只有相关专业人员才晓得曾侯乙尊盘在青铜重器中的顶级位置。2020年春天的战疫行动，也让许多人晓得了湖北武汉在中国地理人文中的重要性。全世界也从湖北武汉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决战决胜中，认识中